

2021年中国GDP增速继续在全球范围内处于领先水平，实现了“十四五”的良好开局。但不容忽视的是，中国经济面临的风险与挑战增多，经济存在一定的下行压力。2021年末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2022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再次强调中国经济仍将面临“三重压力”的挑战。“三重压力”为何会持续存在，2022年“三重压力”是否会进一步增加，宏观政策又要如何应对以实现5.5%左右的GDP增速预期目标。这些问题引起了各界的广泛关注，需要研究与回答。

“三重压力”产生的短期与中长期原因

短期来看，2021年“三重压力”的产生主要与全球疫情持续蔓延、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涨等因素密切相关。“需求收缩”的核心表现是消费和投资两大内需恢复缓慢。消费需求恢复缓慢主要源于疫情影响下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速难以得到有效提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增速持续低于平均数增速。投资需求增长偏慢主要是受到基础设施投资与房地产投资增速下滑的拖累。“供给冲击”主要源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涨与能源供应紧张等多重因素影响下企业的生产约束加大、生产成本上升，突出表现为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的大幅上涨。“预期转弱”主要源于在全球经济复苏动力减弱的大环境下居民与企业等微观个体对未来经济增长预期的减弱。

中长期来看，“三重压力”的持续存在，主要是因为中国经济近年来在经济稳定、经济结构转型与长期经济增长等三个层面所面临的持续压力。“三重压力”本质上是“三期叠加”压力的进一步延续。在疫情出现之前，2019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已明确



□ 刘哲希

2022年“三重压力”或将发生三点新变化

指出，“我国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相互交织，‘三期叠加’影响持续深化，经济下行压力加大”。

具体而言，导致“三重压力”产生的中长期原因主要在于三方面。首先，债务压力持续攀升导致消费与投资需求偏弱，是“需求收缩”产生的中长期重要原因。过去10年，中国宏观杠杆率的攀升速度一直偏快，尤其是居民部门杠杆率从2011年末的27.9%大幅上升至2021年末的62.2%。高债务压力下居民和企业不得不将更大比例的资金用于偿还债务，对消费和投资产生了显著的挤出作用，从而导致“需求收缩”。其次，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中劳动、资本与能源等生产要素供给拐点的相继出现，是“供给冲击”产生的中长期重要原因。供给端生产要素成本的上升将会是现阶段中国经济持续面临的一个压力与挑战，也是中国由以往依托低成本优势的粗放生产方式转向高质量发展方式过程中所必须要经历的阶段。再次，由于中国近年来处于增长动力转换过程，资本与劳动等传统增长动力减弱而全要素生产率 and 人力资本等新动力尚未成型，潜在增速呈现趋势性下降。由此导致居民与企业对未来收入增速与利润增速的预期下降，这是“预期转弱”产生的中长期重要原因。

“三重压力”在中长期因素的影响下会持续存在，而且不同时期的主要表现也会有所不同。2021年“三重压力”主要表现为需求端内需不足、供给端生产成本上升以及预期方面对经济增长预期的减弱。2022年中国经济面临的“三重压力”可能会发生三点新变化，需要注意与防范。

“需求收缩”方面，在内需增长动力有待提升的同时，外需增长将有所承压。2022年，中国消费和投资需求虽然将有所改善，前两个月消费与投资数据也取得“开门红”，但难以扭转内需增长动力不足的局面。居民消费仍会受到收入增速与债务压力等多重因素的制约。投资增速虽然会受到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增速回升的支撑，但房地产投资增速下滑带来的影响将会逐步加大。2022年1—2月，房屋新开工面积同比下降12.2%，这意味着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的下滑势头将进一步加快。与此同时，过去两年呈现高速增长的外需将在2022年有所回落，主要源于三方面因素。一是全球经济复苏动力减弱抑制外部需求。二是海外供应链加快恢复会使得中国出口的替代效应有所弱化。三是在过去两年高

基数的影响下，2022年中国出口继续维持高增长的难度增加。因此，外需增长回落将会成为影响2022年“需求收缩”方面的新因素。

“供给冲击”方面，生产领域的成本上升已开始对消费品领域产生影响，居民生活成本上升压力将有所增加。2022年以来，虽然前两个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涨幅仅为0.9%，但主要是受到在CPI中权重较高的猪肉价格同比大幅下降拖累，2月份猪肉价格同比降幅高达42.5%。从非食品的CPI来看，1、2月份的同比涨幅分别达到2%和2.1%，已处于近年来的较高水平。其中，居民与出行相关的交通通信费用同比上涨5.5%，与居住相关的水电燃料费用同比上涨3.6%，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生产领域能源等成本要素上涨对居民生活成本的影响。进一步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名义增速与实际增速隐含的消费品价格指数来看，2022年1—2月份的CPI为1.8%，高于2021年同期。全年CPI涨幅可能将呈现持续扩大态势，由成本推动的物价上涨压力不容忽视。特别是在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速难以较好提振的情况下，居民对物价上涨的实际感受将显著增加。2022年，对此方面的“供给冲击”要有所重视。

“预期转弱”方面，公众对经济增长预期有所改善，但对资产价格预期的不确定性将有所增加。2021年四季

度以来，随着稳增长政策的加码，公众对经济增长预期有所改善。突出表现为制造业与非制造业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持续回升，分别从2021年10月份的53.6%和58.8%上升至2022年2月份的58.7%和60.5%。但需要注意的是，在美联储开启加息周期与地缘政治冲突加剧等因素的影响下，公众对资产价格预期出现了较为明显的波动。2022年2月份70个大城市中39个城市二手房价格同比下降、57个城市的二手房环比下降，以及3月份资本市场的大幅波动，均凸显了公众对资产价格预期不确定性增加的态势。预期是支撑资产价格的重要因素，而资产价格稳定是保证经济与金融体系平稳运行的关键。因此，2022年要加强对资产价格预期转弱以及由此可能引发的资产价格大幅波动风险的防范。

“三重压力”下宏观政策要加强“三策合一”

面对“三重压力”的持续与新变化，宏观政策应该如何应对，从而更好地实现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5.5%左右的GDP增速目标。一些观点认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应该大幅度增加力度，以超预期的政策扩张应对“三重压力”。但是，货币政策和财

政政策力度不宜过大，主要有以下两点原因：一是过大力度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会加剧通胀预期，从而进一步强化“供给冲击”。二是在美联储开启加息周期与中国政府债务率持续攀升的背景下，中国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空间均会受到一定的制约。力度过大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不仅难以持续，反而会进一步影响微观主体预期，加剧“预期转弱”。

更为妥善地应对“三重压力”，宏观政策需要针对“三重压力”产生的主要原因，从经济稳定、经济结构与长期经济增长三个维度共同发力，打好政策组合拳。经济稳定方面，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等稳定政策要稳健有效，着力促进消费和投资需求扩张，稳定宏观经济大盘，防止“需求收缩”。经济结构方面，要加强运用结构政策应对“供给冲击”。一方面，结构政策要着力对资源配置结构进行优化，突破供给约束堵点，畅通国民循环，在生产要素供给趋紧的情况下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另一方面，结构政策还要着力改善居民收入结构，提高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速，并加强对下游企业和中小企业的结构性支撑，从而弱化“供给冲击”对经济的影响。经济长期增长方面，要通过增长政策切实激发经济增长动力，扭转近年来潜在增速持续下滑势头，应对“预期转弱”。由此可见，应对“三重压力”，宏观政策需要统筹稳定政策、结构政策与增长政策三大类政策，实现宏观政策“三策合一”。这将有助于更好地实现2022年中国经济增长目标以及如期完成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等中长期目标。



平台经济治理如何设置红绿灯

□ 蔡之兵

近日，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召开专题会议明确提出关于平台经济治理，有关部门要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方针完善既定方案，坚持稳中求进，通过规范、透明、可预期的监管，稳妥推进并尽快完成大型平台公司整改工作，红、绿、黄灯都要设置好，促进平台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提高国际竞争力。可见，为平台经济设置好红绿灯已经成为平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前提。

平台经济治理为什么要设置红绿灯？自资本主义制度形成以来，从商业资本、产业资本再到金融资本、虚拟资本，资本要素已经历多种不同形态资本形态的演变过程。作为最新的资本形态，平台资本既继承之前各种不同类型资本形态的能力，又在这种集成中成为超过之前所有资本形态的资本形态。从与其他资本形态的比较看，平台资本既可以像商业资本和产业资本一样，通过控制市场交易环节和产品生产环节得到利润，也可以如同金融资本和虚拟资本一样，通过金融运作和虚拟产品来获得利润。正是由于这种同时具备多种不同资本形态能力的资本特性，由平台资本控制的平台企业也因此拥有能够影响经济社会发展乃至国家治理的能力。

第一，平台企业对市场主体的双向控制力。与之前的企业形态不同，平台企业并非只能影响消费者或生产者单一主体，而是能同时影响甚至控制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企业形态。第二，平台企业对产品价格的精细控制力。与传统企业形态相比，平台企业依靠大数据技术可以对产品价格实施精准定价，极端情况下，平台企业甚至可以实现一人一价，大数据“杀熟”现象实际上就是这一能力的直接体现。第三，平台企业对行业边界的迅猛扩张力。由于高度依赖于互联网这一公共基础设施，平台企业的专业技术门槛往往相对较低，这使得平台企业在行业尤其是相似行业和上下游行业之间的扩张和越界极为容易。第四，平台企业对监管体系的强大穿透力。作为一种虚拟载体，平台企业先天就具有通过平台在不同行业之间轻易扩张的能力，这也使得

传统的行业监管模式难以及时全面把握平台企业的经营信息而经常陷入束手无策的境地。第五，平台企业对国家政权的隐蔽影响力。平台企业的发展基石是用户数量，用户规模越大、平台企业的市场价值和市场支配地位就越强，这种特性已经使得平台企业具备了通过引导社会舆论来影响和冲击国家政权的能力。也正因如此，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呼吁要重视“数字利维坦”对国家政权带来的全新威胁。

可见，平台资本的超级资本属性赋予了平台企业强大的渠道控制力、价格控制力、行业控制力，也使得平台企业一经出现就具有了极强的市场竞争能力，这也是为何过去10余年，全球发展最快的企业几乎都是平台企业的根本原因。然而，也要看到，也正因为平台企业的能力如此之强、影响力如此之大、涉及用户数量如此之多、影响国家治理体系如此之深，通过设置好红绿灯来引导和规范平台企业的健康发展就显得至关重要。

红绿灯应该设在哪里呢？无论是基于国家社会稳定的需求，还是平台企业的健康发展目标，为平台企业设置红绿灯的必要性都毋庸置疑，但问题在于平台企业类型众多、所属行业也各不相同，红绿灯究竟应设于何处就显得尤为重要。

基于平台企业的特点，为平台企业设置红绿灯应坚持如下导向。第一，红灯应设在行业边界上。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虽然绝大多数行业都不应存在特定的资本类型偏好，但在少数能影响国家和社会稳定的如金融、民生等行业，考虑到平台企业庞大用户规模可能导致的社会风险，仍应根据相关法律对平台企业的无序扩张行为设立相应的红灯。第二，红灯应设在价格机制上。得益于自身对市场主体的强大控制力，对平台企业的红灯应该高度重视平台企业服务或产品的价格形成机制。一方面，重视平台企业制定的分成比例或租金水平的合理性，避免平台企业制定的分成比例过高而侵蚀真实生产或服务环节产生的利润。另一方面，规范平台企业的价格歧视行为，避免出现“杀熟”现象，最大程度保护消费者

的合法权益。第三，红灯应设在数据算法上。平台企业掌握了海量的消费者信息，这些数据不仅能为平台企业带来巨大的潜在经济利益，也会给消费者带来较大的安全隐患。因此，对平台企业的红灯设置需要充分考虑如何制定科学完善的数据使用规则，既确保数据使用权益的合理分配，也要保障广大消费者的信息数据安全。因此，未来为平台企业设置的红灯需要格外重视数据算法这一内容。

为平台企业设置的绿灯要体现鼓励平台企业发展的导向。首先，绿灯应设在美好生活需要上。平台企业的快速发展极大满足了美好生活需要，未来仍然要大力鼓励和引导平台企业继续通过满足居民生活、学习、生产方面的各种基本需求来保持发展。其次，绿灯应设在产业短板上。从市值规模和盈利水平看，平台企业已经成为实力最强的企业类型之一。在这种背景下，通过设置绿灯来引导实力雄厚的平台企业进入国家发展体系的短板行业将是平台企业未来发展的最大机遇。最后，绿灯应该设在国际竞争上。随着5G技术的成熟，数字经济成为未来国家竞争的关键领域的迹象已经非常明显。平台企业作为数字经济的主力军之一，能否在国际竞争中占得先机将决定国家发展成败。因此，未来理应培育更多在数字经济领域具有世界级竞争力的平台企业。

设置红绿灯应坚持什么原则？从平稳健康发展和提高国际竞争力的目标导向看，为平台企业设置好红绿灯理应坚持如下原则。

设灯有据。为平台企业设置红绿灯并不意味着要在所有行业中都设置红绿灯，更不能简单依据企业规模大小来选择是否设置红绿灯。从具体目标分析，为平台企业设置红绿灯是为了避免资本的无序扩张与恶性竞争。然而，无论哪种目标，为平台企业设置的红绿灯应有科学合理的界限、清晰透明的规则、易于判断的标准，通过规范、透明、可预期的监管给平台企业以明确稳定的预期和发展环境。

灯数要少。如同没有红绿灯的高速公路的运输能力要远远高于有红绿灯的普通公路，倘若对作为市

场经济重要主体的平台企业进行过多管控，同样会影响经济发展。因此，应有意识地控制为平台企业设置的红绿灯总数，要确保设置红绿灯的权力来源于顶层设计和统筹安排，避免出现单个行政部门或者地方政府为平台企业无故设置红绿灯的情形。与此同时，主要监管部门要尽可能通过完善制度建设，加快推进整体监管、系统监管、协力监管，特别是在应对平台经济领域数据型垄断的挑战中实现信息与技术的有效共享，实现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监管，在控制灯数的前提下，多设置绿灯、少设置红灯，充分发挥平台企业的积极作用。

红灯能停。在为平台企业设置的红绿灯中，红灯的目的在于遏制平台企业的无序扩张和恶性竞争。想要实现这一目标，就需要确保红灯对平台企业的约束性。一方面，要努力提高设置红灯标准的专业性和科学性。在现代金融工具的支撑下，平台企业行为的复杂程度和隐蔽程度已经大大提高，如何及时和准确地识别企业的“越界”和“违规”行为依赖于相关部门专业能力的提高。另一方面，需要提高红灯惩罚措施的震慑性。对企业来说，利润是其行为抉择的关键指标，倘若触及红灯的惩罚成本远远低于其经营所得，平台企业就不会在红灯前停步。因此，想要确保红灯对平台企业行为的约束力，就应在反垄断法中制定与其“闯红灯”行为所获利润水平相当的惩罚标准，不断增强红灯的震慑力。

绿灯能行。推动平台企业按照绿灯指示方向来运行同样是红绿灯的重要功能。一方面，平台企业有自己的运行逻辑，比如追求利润水平的提高、追求市场垄断地位的增强等都是其基本行为逻辑。然而，另一方面，国家发展战略也期望平台企业能够在特定领域发挥更多、更好的积极作用。在这种背景下，绿灯的引导和指示作用就是平台企业能否按照国家意志运行的关键前提，这就要求绿灯不能只是简单的准入型信号工具，而应该包含更加丰富、更加有效、更加精准的鼓励型工具集，能够有力支撑和引导平台企业进入国家希望其进入的行业和领域。

（上接1版）

把握时代脉搏,坚持守正创新,推动红色资源绽放时代华彩

注重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根铸魂；高度重视传播手段建设和创新；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中国共产党的故事。用好红色资源，坚持与时代同行、与发展共进，不断创新方法、手段、形式，让红色资源永葆红的底色、彰显红色魅力、绽放时代华彩。

解码“红色精神”。贯通历史与现实，用历史眼光从昨天观察明天、以历史智慧用过去映照未来，注重加强对红色资源和红色基因传承的理论研究，抓好红色遗址、红色文物、红色文献史料、红色口述史料的征集整理与调查研究工作，挖掘提炼其历史价值和时代意义，回答好传承什么样的红色基因、如何传承红色基因等重大问题。

讲好“红色故事”。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讲事实、讲形象、讲情感、讲道理”的重要指示要求，讲好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事实，讲好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光辉形象，讲好党员干部与人民同甘共命运、以人民为中心的深厚情感，讲好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的深刻道理。根据从1925年到1949年广西第一个党支部成立到广西全境解放的革命历史题材，广西摄制革命历史题材纪录片《红色传奇》，开展纪录片进校园、进机关、进农村、进社区活动，收看体验人数达2000多万人次，读本发行量达620余万册，主题曲《记住你》广为传唱，全区掀起一股“红色传奇热”。

创新“红色课堂”。结合新时代、新特点，引入新技术、新形式，构建“中央厨房”式课程开发和资源供给体系，挖掘整理一批经典红色故事、红色歌曲、红色诗词、红色家书，综合运用讲授式、研讨式、案例式、模拟式、体验式、访谈式、情景式教学方式，不断增强党史学习教育的直观性、创新性、实效性，增强红色资源的传播力、影响力，让红色资源、红色记忆活起来，让红色血脉流动起来。广西结合党史学习教育，深化对党忠诚教育，创新开展“十场名家云直播”“百名讲师示范课”“千场党课下基层”“打卡红色教育基地”等活动，开设“茶园党课”“田间党课”“海上党课”“边关党课”以及“奋斗百年路、忠诚印寸心”“誓言铮铮铸忠诚”等精品情

景课、现场课，深受党员欢迎，充分放大“红色效应”。

建强“红色师资”。加强高校、各级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党史党建人才队伍建设，提高红色师资专业化水平。根据不同领域、不同群体、不同类别党员干部的需求，建立共建共享“名师库”，着力打破师资队伍条块分割、地域分离的现状，推动红色师资跨行业、跨领域、跨地区开展教学服务。全面落实领导干部上讲台制度，让政治素质过硬、实践经验丰富、理论水平较高、善于课堂讲授的领导干部成为红色教员，建设专兼结合的红色师资队伍。

健全完善红色资源开发保护和利用长效机制,让红色基因、红色血脉代代相传

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强调，用好革命遗址遗迹、纪念馆、博物馆等红色资源，发挥革命英烈、时代楷模示范引领作用，以重大节日和纪念日为契机开展主题活动，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刻领悟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丰富内涵和时代意义，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我们要认真贯彻落实《意见》，健全完善红色资源开发保护和利用长效机制，发挥好红色资源在党史学习教育、党性修养锻炼中的教化功能 and 作用。建立红色资源数据库，加强革命遗址场馆规划、建设和管理，完善基础设施，增强承载能力；运用数字化、信息化技术手段，加强革命遗址场馆升级改造，提升学习参观体验；正确处理城市开发建设和革命遗址保护利用的关系，把更多红色资源纳入旅游线路，推动“红色资源+旅游”发展。加强对红色教育现场教学的标准化规范化建设，编写一批体验感、代入感强的红色现场教学方案，培育一批红色宣讲员，提升红色教育现场教学效果。健全完善领导班子和党员干部思想政治教育制度机制，结合民主生活会、组织生活会、主题党日、“三会一课”、重温入党誓词、过“政治生日”等方式，推动新换届领导班子成员、新提拔干部、新交流干部、新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到红色现场教学点接受以党史学习教育为主题的党性教育，带动学党史、知党史、用党史在全社会蔚然成风。

（作者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